

长乐海外移民的历史传统

尹雪梅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2002 级研究生 福建 厦门)



作者近照

长乐地处东南沿海闽江口南岸,航运事业发达,是我国新兴的侨乡,也是福建省重点侨区之一,具有悠久的海外移民传统。改革开放后,大批长乐新移民更是以各种渠道涌入海外。据长乐市侨务办公室人口普查所得,约有 20 万长乐人在美国。每年通过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汇入的外币不少于 3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地下钱庄、黑市兑换或亲友回乡探亲等各种途径带回的汇款,据估计,其余途径带回长乐的汇款,应是正常汇款的数倍。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数量和海外汇款,不得不引人深思,是什么因素驱使大批的长乐人不畏艰难与危险,以各种途径奔赴海外。这其中必然涉及经济、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等因素,本文试图从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角度对长乐海外移民进行考察。

(一)港口地理位置和人口压力

长乐位于福建省省会城市福州以东,闽江口南岸,具有优良的港口地理位置,对外交通发达,具有海外移民的有利条件。古书记载长乐“东滨大海,西接瀛洲,首石峙其北,长江经其南”^[1]。闽江则是长乐对内、对外交通便捷的主要因素。闽江“为福建省第一巨流,其流域约占全省面积 2/3……距福州城约六十里……”^[2]。闽江庞大的流量和广阔的流域起到了沟通八闽内地,集结、疏散货物的作用,带动了福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

古代福州港的海外交通相当便利,海外贸易也相当繁荣,有不少福州商人从事海上贩运贸易,与新罗、日本、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大食及西亚、非洲诸国都有贸易往来,位于闽江上游的浦城、建瓯、光泽、建宁等县的土特产品茶叶、

木材等经小溪运入闽江,集结于福州,通过福州港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输往各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福州,称“闽江从福州穿城而过,江两岸的建筑物庞大漂亮,在这些建筑物面前停泊大批船只,满载商品”;许多商船从印度到这个港口”^[3]。福州港古代繁荣的海外贸易由此可见一斑。

长乐隶属福州府,与福州相距甚近,所辖区内有众多大小的天然良港,如梅花港、太平港等。这些港口是近海的重要口岸,都在福州港道内,都属于福州港区。古代福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也必定带动长乐港口贸易的发展,不仅如此,长乐港口还是中国册封使漂洋过海的出发地。在出发前,抚按三司先在南台设宴饯行,然后用在福州制造的册封舟送册封使至闽江口川石或梅花千户所,祭过天妃,候风登舟启航。^[4]可见,古代长乐的港口贸易和海外交通也是相当发达的,这就形成了长乐海外移民的有利条件,从而推动长乐海外移民的发展。

此外,人口压力也是长乐人民向海外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福建人口总体保持着大增长的势头。单就宋代一代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来。北宋福建人口户数占全国户数的 6.67%,到南宋嘉定,福建人口户数就占了全国户数的 12.62%。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从 6.67%进到 12.62%,速度可谓很快了。^[5]以明前后比较,也是福建较全国增长势头快。全国人口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光绪十三年,增长 5.2 倍,而同期福建却增长了 13.2 倍。^[6]全省人均耕地也从北宋

元丰 5.4 亩降到清乾隆十八年的 1.7 亩,降到咸丰元年的 0.65 亩,光绪十三年 0.54 亩。^[7]

明以来,长乐人口也呈现不断增长之势,到了清代,人口增长幅度就更大了。如清初长乐人口为 50688 人,到了道光元年人口就高达 127149 人,是清初人口的 2.5 倍。人口大幅度增长,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多,清初二次迁海政策又使沿海的土地大量抛荒,如顺治十七年(1660 年),清政府处于政治原因考虑,实行迁海政策,将福建沿海居民“尽令迁移内地”,长乐土地抛荒 1836 顷 85 亩。^[8]海禁毕竟是一种临时政策,在其取消后,长乐耕地略有增多,但由于沿海土地不利于耕,开发空间很有限,所以长乐的人均耕地仍成递减趋势。如宋代长乐人均耕地 0.94 亩,到了明代人均耕地只有 0.66 亩,到了清代道光年间,人均耕地就只有 0.25 亩了。^[9]按照明清时代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均应有 3—4 亩耕地才能维持生计。^[10]长乐的人均耕地从宋代以来从未超过一亩,大大低于农村维持生计所需耕地的最低标准。土地的承载力就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就必定推动人口的迁移。但是福建内地多崇山峻岭,移民的余地不大,因此,沿海人民惟有通过出洋一途以谋生了。

(二)悠久的海外移民传统

早在汉代,长乐就有了与海外的交通;唐末五代时,城关东门王彦英举家浮海避难新罗为长乐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华侨。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廷招36姓赐予琉球,向海外移民。长乐梁边人梁嵩到琉球中山王府任长史司,其子孙成为现今日本冲绳县兼岛氏望族。^[11]然而对长乐海外移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了。

郑和下西洋与长乐有着密切关系。闽江口的长乐太平港海面辽阔,风浪平静,距福建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福州水程120里,往来方便,外有五虎门为屏障,出五虎门即是大洋,是个理想的港口,被郑和选作为七下西洋的航海基地。《闽中记》云:“吴王夫差尝略地至此,作战舰,称吴航云。国朝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舟于此,奏改今名。”^[12]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在太平港驻泊伺风,等待北风起时,便扬帆出五虎门开洋。在《长乐石文志》中亦载:“石文天妃庙建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往西域取宝,厥后朝廷遣使封琉球中山王,俱在此设登开船。”^[13]

福建造船业发达和航海人才众多也是郑和选择长乐太平港作为远洋航线的港口主要原因之一。长乐是造出洋巨舰的重要之处。“(永乐)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与长乐,时称郑和为三宝下西洋,师还闽中,从征将士赏有差,先是长乐有十洋成市状元来之,至是造舟于此”,^[14]郑和下西洋前,“诏书既下,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该处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15]郑和下西洋规模庞大,人数众多,不可能都从都城带去,所以大部分随从人员应该是闽江口附近具有航海经验的当地人。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要派人到福建,“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16]长乐地处沿海,有大批富有航海经验的人员随着郑和船队下西洋,并立下赫赫功劳。如长乐人黄参,“字求我,至德里黄里人,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驻长乐造舰下西洋,参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累

迁游记定远将军及和总管府中军”,^[17]“在其举荐下,邑人从之者众,随之远航”。^[18]然而只有功绩凸显的才会被载入史籍,随郑和下西洋的长乐人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记录,但从长乐在出洋航行中的重要港口位置,不难推断这个数目不会少。

郑和下西洋选择长乐作为远洋航行的驻泊处,对长乐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它进一步推动了长乐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更开拓了长乐人民传统的海外交通,不仅带去一批长乐人民移民海外,而且使这种不畏风险地向海外移民的传统,生生不息地得以延续。在此之后,长乐人民沿着祖先的足迹,无畏大海的艰险,源源不断地向海外发展,不仅如此,在近代以后,还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份子。

清末,洋务派在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也推动了长乐的海外移民传统。长乐位于学堂附近,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发达,有大批长乐人毕业于该学堂。如高鲁,字曙青,龙门乡人,光绪二十四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光绪三十年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出国学习;高而谦,字子益,龙门乡人,光绪八年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制造班,专攻法语和造船专业,光绪十一年毕业,翌年初夏,与柯鸿年等33名同学赴法国巴黎大学律例大书院学习《万国公法》。^[19]这些长乐人是近代第一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兴知识分子,不仅掌握了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受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的影响,在思想上“开风气之先”。所以,相对其他航海地方的人而言,长乐人向海外移民的思想更加大胆,接触西方国家的意识更加强烈,更具有移民海外的勇气和意识。

此外,也有不少长乐人是由于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移民海外的。清朝初年,厉行海禁,沿海迁界,一部分长乐人因不满清朝的统治或迫于生计,偷渡出洋。如越南侯郑怀德,其祖郑会就是因为不堪清廷发布易服剃发令而留发南逃,至越南边境寓居的。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以诱骗手段招收所谓的“契约劳工”,运送到海外从事苦役劳动。据不完全统计,至民国6年,长

乐输出劳工达1万多人。民国初年,“猪仔公司”受到抵制,长乐人转而采取旧客带新客的办法,由在海外的亲朋“牵拔”出国。当时营前、黄石、下洋、洋屿、霞洲、龙门、井下等乡村旅居印尼泗水的比较多,仅洋屿一村就有100多人出洋谋生。^[20]战后南洋群岛的长乐华侨和原在港台地区定居的乡亲,不少人移居美国,为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长乐人到美国谋生创造了条件。

(三)区域文化的影响

长乐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外移民传统形成了长乐特殊的区域文化特色。福建省背山面海,地狭人稠,“欲就耕而无地辟”,沿海居民自古以海为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长乐沿海之地,也多不利于耕种,古云:“长邑,一弹丸区也。负山而枕海,自北而南,咸潮往来,不利于稼,其依山处,所非无清泉涌发,又往往迅速入海,不能资之以利用”^[21],且“近海者患潮入,必堤堰以障之;负山者患泉泄,必湖塘以渚之”^[22],故“沿海之民,以渔为生,每患谷竭,专依浙、广米,至则米价差平;不然,则苦饥甚于内地”。^[23]由于耕地的严重不足,人口过于稠密,长乐人民不得不以海为田,战狂风斗恶浪,这就造就了长乐人民坚忍不拔、不畏强暴、敢于冒险的海洋意识,不管什么朝代,都会冲破重重险阻,奔向海洋。同时,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又培养了长乐人兼容与开放的精神,海外移民为求生存和发展,具有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这种海洋与农耕文化相结合,就形成了长乐区域文化中的“海耕文化”,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海耕文化”表现在长乐人民具有海洋性与大陆性兼备的人文特征。海洋性体现在百姓心目中,没有严格的海洋边界观念,对他们而言,万里海洋也是他们劳作的疆土。明崇祯十二年,给事中傅元初在《清开洋禁疏》中就明确指出:“海上,闽人之田,海禁一严,无所得食,……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如鹜”,正因为“近海之民,走还如鹜”,故长乐素有“海员之乡”的赞誉,供奉海神妈祖的庙宇特别多^[24]。这种以冒险性

为主要特征的海洋性人文特征,使长乐人民自古就不畏海洋,一千多年前就有人出国谋生了。唐末,为避战祸,一部分人逃往印尼爪哇岛;宋代,有成批的水手出国;元朝,遣使郝、阮、朴、樊五姓到满喇加国(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明清以后出国的就更多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谋生,一部分长乐人更是铤而走险,以各种方式偷渡国外。大陆性文化主要体现在长乐人民自古尚正统、重教化的文化传统。由于历代重视文化的传播,人才的培养,故长乐自古便有“海滨邹鲁”之称。古籍云:“长邑百里区,自唐迄明,代有名臣大儒,理学文章,后先辉映,至今科目之盛,常甲诸邑”^[125];“郡之儒风最盛,闽侯而外,则长乐、连江、福清其上也……”^[126]。《闽书》亦云:“辩贵贱,序长幼,有古遗风”。正是这种尚正统、重教化的大陆性人文特征,使长乐海外移民无论什么时候都心系祖国,不仅在海外传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而且非常重视乡情、亲情,往往是一个人出国后,又接着想尽办法把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一个村落都接带出去。海耕文化所培养出来的开放、进取、冒险等海洋文化精神,有效地克服了农耕文明所带来的因循守旧、中庸封闭,同时又把传统的大陆性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相融合。因此,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福建内地,长乐人更具备了坚忍不拔、开创、拼搏的人生态度,以及迁离祖居地所需的叛逆意识和冒险、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文化是一个地域历史发展的反映,又具有相对稳定性,长乐“海耕文化”的形成,固然与其悠久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同时又深刻影响着长乐人民出洋冒险行为。

从历史和区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传统的海耕文化,优越的海港地理位置,得现代航运业风气之先,这一切使长乐区历来航海人才辈出,培养了长乐人民一种坚忍不拔、不畏强暴、敢于冒险的海洋意识,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使长乐人民与海外乡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外移民的传统息息不断。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优秀的航海技术,近代一大批长乐人在香港、新加坡的航运公司充当海员。正是

这一批先驱者,在六七十年代跳船留滞美国,以勤劳的劳动在美国立脚,此后带动了更多的长乐乡亲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奋斗,形成美国庞大的长乐新移民群体。在今后的不久,这个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移居海外的长乐人民不仅可以丰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对家乡建设作出贡献,对他们的潜在的力量不可忽视。从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角度分析长乐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对大批长乐新移民冒险出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明)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卷二《地理》,第32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2] 陈文涛编纂《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第19页,福建远东印书局印行,民国18年。
- [3]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333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 [4] 《福州港史》第43页,福州港史编辑委员会,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版。
- [5] 《福建历史地理》改编本,第一册,第88页,福建省地图编纂委员会,1976年版。
- [6] 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第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90页、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8] (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卷九,《赋税志》,第213页,福建省地方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9] 根据民国李驹主纂的《长乐县志》统计而来,卷八《户口志》第186—187页,卷九《赋税志》,第213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10]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第23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1] 《长乐市志》卷36《华侨》,第876页,长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人民

出版社。

- [12] (明)王应山纂《闽都记》,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
- [13] 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抄本,第10页,转引廖大柯《福建海外交通史》。
- [14]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271,《杂录·明祥异》第14页,清同治十年正谊书院刻本。
- [15]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272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41—42页。
- [16]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第6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 [17] 《黄氏族谱》,引自《长乐六里志》卷下,福建师大图书馆藏1964年油印本。
- [18] 吴湘泽等《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的探讨》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1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 [19] 《长乐市志》第四十,《人物》,第994页,第996页,长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 [20] 《长乐市志》卷三十六《华侨》,第877页,长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 [21] (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卷二十七《艺文录上·南陂记》,第741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2] (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第五《水利志》,第76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3] (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卷三十《杂录·同治彭志》,第1260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4] 《长乐市志》卷三十七《宗教》第一章,第888页,长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变,福建人民出版社。
- [25] (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卷二十七《艺文录上·重整吴航书院碑记》,第749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6] (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府志》卷二十四,第685页,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